

幸福路向左还是向右

沈琦华

上海的马路多以地区命名,但也有... 幸福路位于长宁区东南部,北起平武路,南迄法华镇路,1932年筑路,曾名敦惠路,1956年改今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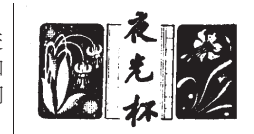


“我的品位最简单,事事止于至善,我就满意了。”

钢琴家波格莱里奇10岁从贝尔格莱德到莫斯科音乐学院学钢琴。16岁那年,有一位朋友带他到一位苏联外交官家里做客,他弹了一首曲子给大家听,外交官的夫人突然对他说:“你没有好好发挥你的天才。”

不过前段时间,老友作家杨葵给我发来他著的《就不存在一个叫幸福的东西》。他有不同看法,“若说生活,哪一种幸福不是指向你的心灵,引发你灵魂共鸣呢?”

我和葵兄当年都曾为地产商潘石屹的SOHO小报写稿,同时代的撰稿人中还有后来做手机的罗永浩。不过如今地产商潘石屹的手中已经没有多少地产了,老罗也从做手机干到了直播带货。



口香糖

任溶溶

我小时候人们爱嚼口香糖,即香口胶 chewing gum,爱嚼着口香糖看电影。特别是老外,嚼口香糖简直不停。

还记得美国作家斯坦贝克的苏联游记,说他住的旅店浴室有个洞漏水,他没办法,忽想到用口里的香口胶糊住洞眼,水就不漏了。

大概还是疫情拐点后没多少日子,小阮来电话说,可以来了。一进门,第一件事她没去拿抹布,而是拿出一个信封,说,这是你给我的钱,我要还给你。说完就干活去了。

明日请看《牡丹花的绽放》



重灾区。除少数几家部队家庭未受冲击,许多人都成了“革命对象”,这也是采访时口述者共同的记忆。

从改革开放年至今的这段回忆还是最清晰的。湖南街区、武康路、武康大楼的变化,大家身临其境,常有日新月异之感。从个人生活而言,都是这个时代的受益者,有的人获得多一点,感受强烈些,有的人获得少一些,感受就弱一点。

显然,住在这里的是一群文明素养较高的居民,从他们的谈吐中可以发现,他们对这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也是有批评的。但他们的态度是善意的、平和的。他们有自己的“在地意识”,不只是对居住地怀有感情,更有对居住地价值的认知。

作为保护建筑,武康大楼的老居民也有担心,那些新搬进来的业主,他们会爱惜和保护老房子吗?他们会不会只看重这里的名声或地价?所谓保护建筑,最主要的保护者是两个:一个是政府,一个就是住在里面的居民。



郊野公园 (国画) 鲍莺

条街,一年半就可以恢复。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构焚毁了,它则永远不能恢复。”

最后说到爱恨交加,上世纪初年,张元济先生曾在上海建立涵芬楼即东方图书馆,为当时私家藏书之冠。但一九三二年初日本轰炸上海,炸毁上海商务印书馆,将几十万册书付之一炬,焚书的纸灰弥漫在空中,持久不散。

为儿子改主意了,主要在这里,他老子的眼皮底下没法痛快玩电子游戏。她说。我心想,好吧,扫地机、长拖把,还有什么多快好省的干活家伙?统统进购物车吧。

再下一日,说真不回去了,儿子女儿也不来了。这是第一次,他们家分开过。因为新冠疫情,怕回去的来不了,来的回不去了。我一面嘴上安慰着她,这样也好,反正现在手机视频也很方便的,她低声说了一句什么,我没听清也真没在意,一面窃喜着,能来,好啊。

一直到现在疫情越来越严重了,小区严防严控了,她也就进不来不能来了。我当然是要遵守规定的,也担心传染问题。又想着,她在这里,既不能享受天伦之乐还赚不到钱的双重损失,就一改沮丧样,高姿态对她说,小阮,我们都要照国

住宅市场化后,武康大楼自建成以来,第一次发生了个人拥有产权的情况。租赁者身份相对整齐,上海户籍居多的状况开始改变,许多外地人、外国人相继住进武康大楼。它也是中国急剧变化和流动性的反映。上海这个移民城市就是这样在原住民和外来者,在传统和现代的碰撞中激发活力。

从每个人的口述来看,大抵是围绕自家

他们的集体记忆

陈保平

在这幢楼的个人生命史展开的。我们能通过他们的叙述,看到大历史在这幢楼里留下的印记:孔祥熙的财产、蒋经国的“打老虎”、宋庆龄的来客、周恩来与大楼内文艺界人士的呼应……当然,还有像沈仲章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偷运“屈臣氏”,为中国文化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,曾长期住在这里。

如果武康大楼缺少这些风云人物,没有居住者耳闻目睹的这些故事,仅仅作为一个建筑典范,居住者的口述价值就会减弱许多。

相对个人的述说,我们更看重他们集体的记忆。如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“文革”前的那个年代,大家的总体感受还是正面的。对新社会有着热情和期待,工作上普遍爱岗敬业,像那位被居民赞誉的“老叶”、护士长许宝英等,都是上海职业素养的代表。人与人之间关系也比较简单、平等。主楼与汽车间的孩子一起读书、一起玩,并无阶层的隔阂。紧接着就是“文革”的开始。由于这幢楼许多居住者身份的原因,这里成了



武康大楼现有居民143户。其中主楼96户,新楼9户,辅楼汽车间改造的38户。从职业情况看,当时的老住户大致可分为四类:一是干部,二是文化界的人士,三是工商业者,四是住在汽车间的普通劳动者。房屋可以买卖后,新进住户的职业就比原来要复杂些,但就其经济地位来看,大都是中产阶层或以上吧。而居住者的文化程度从1949年以来到现在,大抵保持着一半以上是大学毕业。我们是在做了一定的案头工作后,请湖南街道组织召开了一个近三十人的武康大楼居民座谈会。从中选择了不同年代人住、不同房产性质、不同职业、不同年龄的十几位有代表性的居住者,还有两位访谈者是与大楼有密切关系的居委会书记柏祖芳、大楼物业经理杨继强。

武康大楼产权的变化,最能反映出时代的变迁。这幢楼最初属于法租界的一家私营公司。抗战胜利后,租界取消,原为日本公司所有房地产,均收为国民政府所有。一些未经处理的产业移交中央信托局继续处理。武康大楼当时就属这类未了产权。后来据说孔祥熙和他女儿孔令伟买下该楼。但孔家的财富积累一直受到外界质疑。1948年蒋经国来上海“打老虎”,就把孔家作为重点监视对象。1949年上海解放,人民政府把这幢楼作为敌产没收,划拨给徐汇区房管局管理。除部分解放前留住工商业主的房子保持不变,大部分房子都由政府部门分给南下干部、部队家属、文化界人士。这一方面与这一区域文化单位较集中有关(如音乐学院、交响乐团、电影公司等),另一方面反映出刚解放时党对文化界人士的重视。

自古焚书,大抵出于两种原因,一是恨书,二是爱书。这话听起来有些矛盾,恨则焚之,还可以理解,爱又何以要焚烧呢?先说恨书,焚书者究竟恨什么?无非是恨书扰乱人心,恨书启发民智,恨书记录历史。如此认识,秦时李斯说得最清楚:“古者

恨书、爱书与焚书

俞晓群

猎,萧萧阳马虽老犹骏,徐娘虽老犹尚多情。”虽然梁元帝视力不好,却酷爱读书、藏书,经常让几个人轮流给他朗读经典,通宵达旦。朗读者听见他鼾声如雷,便偷偷删去一段,梁元帝醒来会指出,某段为什么不读?再者梁元帝藏书巨多,后来他被北魏军队围困城中,危急时刻,他首先想到将十余万册藏书全部焚毁。因此留下“由爱书而焚书”的千古奇闻。他临死之前,含泪写下四首诗,然后捧着诗,被人塞进土囊中压死。其中一首写道:“人世逢百

德国纳粹也是恨书出了名的,他们曾将德国一万多座图书馆中的三千多万册图书尽数烧毁。非但如此,他们还入侵一个国家,还要重点烧毁那里的文化构建与图书。如王强曾在《犹太书籍年鉴》中读到,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八日,德国《法兰克福报》写道:“对我们来说,毁掉公认为波兰最大的法学院是无上光荣的事。我们将巨大的库藏扔出建筑物,把书籍运到集市上付之一炬,烈焰持续二十小时之久。卢布林的犹太人聚集在周围失声痛哭,哭声几乎把我们淹没。我们召集起军队,士兵们兴高采烈的欢呼声盖过犹太人的痛哭声。”

六,天道异贞恒。何言异螻蚁,一旦损鹏鹏。”

还有清代纂修《四库全书》,花费十余年时间,篇幅浩大,不可谓不爱书。但他们在纂修时,大量销毁不利于清朝的书,剿灭明人作品,甚至殃及两宋,如岳飞的《满江红》名句“壮志饥餐胡虏肉,笑谈渴饮匈奴血”,也被改为“壮志饥餐飞食肉,笑谈欲洒盈腔血”。鲁迅在《病后杂谈之余》中写道:“现在不说别的,单看雍正乾隆两朝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,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。全毁,抽毁,删去之类也且不说,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。乾隆朝的纂修《四库全书》,是许多人颂为代之盛业的,但他们不但捣毁了古书的格式,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;不但藏之内廷,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,使天下士子阅读,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,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。”所以鲁迅说:“清人纂修《四库全

书》而古书亡。”

最后说到爱恨交加,上世纪初年,张元济先生曾在上海建立涵芬楼即东方图书馆,为当时私家藏书之冠。但一九三二年初日本轰炸上海,炸毁上海商务印书馆,将几十万册书付之一炬,焚书的纸灰弥漫在空中,持久不散。史记一位日

日……”这样的思妇诗,会因思小阮这个妇也生出几分哀怨来了。看来诗真的是能让人有代入感的。

现在你知道了,小阮到底来不来的纠结,就是怕了她不来的意思了。其实,她不来的时候,也基本上就是每年春节这段时间,有好几年也还没回去。但是因为她的预报,受着在老家念初中的儿子和女儿的人工调度,不是很准,她大概不知道,我心里随之的阴晴不定很难将息。今年因为受疫情的影响,就更加严重了。

她先说,小孩要补课不能来这里,她要请假半个月回家过年。人之常情啊,我有心里准备:好,没问题。某天她来了又说,不回去了,儿子女儿都能来了。两全其美,简直佳音了。

再下一日说,还是要回去了。到底来不来啊,定了吗?我问。因

她到底来不来呀

蓝山